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7.01.001

新闻传播史专题研究

主持人:湖南工业大学阳海洪教授

[主持人语]本组专题文章,从不同侧面对“中国新闻传播史”若干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析,以期引起学界之关注。阳海洪《论民族主义与民国新闻教育的合理化建构:以“成舍我方案”为中心》一文,以民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成舍我为个案,尝试运用政治学范式,探讨自美国移植而来的新闻教育在中国落地时如何进行自我合法化论证及其当代价值;路鹏程《政党为体,党报为用——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期党报思想述评》一文,从“体用”关系出发,详细描述了孙中山辛亥时期党报思想“路线图”,并指出其症结所在;许莹《试论邓拓办报的“书卷气”》一文,详细梳理了邓拓“书卷气”的内涵,在为邓拓正名同时,也冀图在历史对话中彰显反思历史与继承革命遗产的学术态度;许静波《狂欢抑或失范:新媒体场域下历史类话题的发酵与传播——以“崖山之后无中华”为例》一文,则以“崖山之后无中华”为个案,对当前历史热现象进行了反思,探讨了在新媒体场域进行理性、科学对话的可能性。

论民族主义与民国新闻教育的合理化建构

——以“成舍我方案”为中心

阳海洪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民国新闻教育本自美国移植而来,但面临社会的合理化质疑。成舍我以国家建构为合理化源泉,从改造社会入手,主张创办大众化报刊,培育现代国民,实现民族建国的任务。为此,需吸纳平民教育、工读主义等资源,创办“职业教育”+“文化教育”的混合式新闻教育,从“术”“学”和“德”三个方面培养“手脑并用”的记者,消灭体脑之别与劳资之分,改变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互动方式,实现社会改造与民族建国的目标,形成了“立国—立人—立报—立己—立教”的合理化设计。这种合理化路径,以实现商业价值与文化改造为目的,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色彩。

[关键词]民族主义;民国新闻教育;合理化;“成舍我”方案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7)01-0001-07

Nationalism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cusing on “CHEN She - wo Plan”

YANG Hai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transplanted from the US while faced with social

收稿日期: 2017-01-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新闻思想的生成与流变研究(晚清—民国)”(15YJA860016);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新闻思想研究(晚清—民国)”(15A052);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民国新闻教育思想研究”(XJK014BLL002)

作者简介: 阳海洪(1969-),男,湖南冷水江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新闻史论、影视批评。

query for its rationalization. Taking national construction as the source of rationalization, Chen She - wo began with the reforming of society, insisted on founding popular newspapers, cultivating modern citizens and fulfilling the task of founding a national state. This involved in absorbing the resources of civilian education and work - story doctrine, setting up a mixed journalism education combining with professional and cultural education, cultivating journalists being good at using both hands and brains based on "skills", "learning" and "morality", eras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hysical and mental labor and that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changing the interacting manner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mmon people,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ocial reform and found a national state. This was the so - called "founding a state - cultivating person - establishing newspaper - self - improving - promoting education" rationalization path with a noticeable color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an aim of business value and cultural transform.

Key words: nationalism;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ationalization; "CHEN She - wo Plan"

“合理化”(rationality),也叫“理性化”,源于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意指理性的思考和计算。它要求人们在各种行动中,评估其效益和功用,并做出合乎理性的权衡。在韦伯看来,合理化、功能化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在文化、社会和文化等三个方面合理化的过程。在讲究效益和以功利为目的的现代社会,任何知识、技术和社会分工只有经过合理化设计与论证,才能被现代社会制度化,并通过教育方式进行职业训练,从而使人类支配环境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创造出空前的文明成就。

新闻教育是现代社会合理化的重要内容。“新闻教育是一个新兴的部门,它是否有独立的价值,到现今还在许多人的争论中”。^{[1]86}在政府层面上,国民政府基于“以党治国”的需要,才于1937年创设中央学校新闻系,培养文宣人才。1945年,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决议“提高新闻者学术与技能”,成立新闻研究班、新闻事业专修班,至此官方才赋予大学新闻专业设置的合法地位。而在社会层面上,民众对新闻教育亦存疑惑,或认为记者是天才似人物,新闻教育无法培养;或认为新闻本就无学,记者乃“文人末业”“新闻事业至今还大部分被社会鄙弃,被民众漠视,被现实分离是十分确实的。”^{[2]203}传统“学徒式”的作坊教育,亦可造就。因此,在现代新闻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如何应对社会质疑,合理化从美国移植而来的新闻教育?如何适应和改造密苏里的课程体系?新闻教育在中国逐渐普及,成为建制化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的现代化追求有何关联?这些问题始终未获学界的高度关注。

民族主义是现代中国“最为蓬勃的意识形态和

政治力量”,是影响现代中国的最大动力。^[2]美式新闻教育的迅速合法化,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民族主义不但没有导致中国知识界排斥美式新闻教育,反而促使他们引进新闻教育以谋国家现代化”。^{[3]284}民元之后,“国家”与“民众”两橛造成权力的碎片化,在皇权废墟上并没有建成现代国家,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使命并未完成。民国新闻教育思想虽“多元呈现”,各具特色,^[4]但以“国家建构”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成为影响民国新闻教育思想的建构的巨型话语。简言之,新闻教育的合理化是在国家建构中实现自我思考与话语建构的。这种合理化“不仅构成了教育的目的,从而规定了教育的内容,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的合理化模型。学科和课程的安排对应着社会和国家的制度性安排,教育制度的结果不过是社会制度结构的理想化形式。”^{[5]1372}

成舍我是民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是“培养学生最多的新闻教育机构创办人”,^[6]他的报纸“大众化”实践及其相应的教育思想,被研究者称之为“成舍我方案”,^[7]在民国新闻教育界颇具典型性。以“成舍我方案”为关照中心,在民族主义脉络下,探讨民国新闻教育建构合法性的逻辑路径,梳理其在回答要不要办新闻教育问题的同时,如何回答办什么样的新闻教育的问题,以为当代中国新闻教育改革提供历史资源,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

— “立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培养现代国民为前提

在封建帝制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民族主义的兴起,敲响了旧政治体制的丧钟。民族主义以人民主权为合法性基

础,将“人民”从族群、地域和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在平等权利基础上组成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思潮彻底改变了传统王朝和帝国体系,“人民”“大众”“群众”浮出历史地表,成为知识精英的思考焦点和合理化源泉。

(一)民族主义与“立人”话语的出场

晚清时期,日趋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促使知识界反思中国致败之因,并将之归因到民智愚昧所造成的国民竞争力的缺失,报纸所具有的大众传播与底层渗透能力成为关注的焦点,认为这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必要条件,由此主张“广办新报”,“浚导文明”,养成现代国民,推动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开创了报刊引导思想文化的新时代。^[7]将报刊作为“新民”手段必然要求对传媒本体做出结构性调整,以使普通民众能够接受新闻的影响,促成了以普通民众为阅读对象的白话报刊的勃兴。^[8]五四思想启蒙是这场“新民”运动的赓续,五四精英通过对民国建立后的政治现实的反省,对建立现代国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意识到具备现代意识的国民才是国家的基础,“立人”是“立国”的前提,必须在知识分子和民众的互动中进行文化改造,重塑新型的民族精神,从而从根本上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重新开路。

成舍我曾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主张以教育方式培养健全个体,保证社会自治目标的实现,^[9]思想徘徊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具有两歧性特征。^[10]¹⁸⁹但鉴于民族危机的现实处境和民族建国的历史要求,作为自由主义报人,“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的最高目标”。^[11]³⁷简言之,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只是弱小民族反抗强权的策略性话语,是民族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民族建国才是现实而迫切的目标。在成舍我看来,“民族主义,固弱小民族自救图存之唯一法宝”,^[12]深切意识到,“眼前的国际环境,尚容不得我们将民族或国家的界限,独自消灭。中山先生所说:我们应当有民族主义,走到世界主义,却不能先把民族主义丢了,去讲世界主义,正是这个意思。”^[13]成舍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并且参加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蔡元培、徐宝璜等人认为新闻事业“在文化运动中,占甚重要的地位”,呼吁记者“立在社会之前,创造正当之舆论”,强调要对记者进行专业和道德训练,承担改造社会,重建国家之责。“我们要发挥舆论权

威,一方面建立民主自由的国家;一方面改造封建腐恶的社会”,^[14]¹⁷³这就是中国报人的历史宿命。

(二)“立人”困境与成舍我的职业追求

五四并没有完成“立人”以“立国”的国家建构目标。五四精英虽具民主思想,意识到“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在向民众传播现代思想,重造底层文化方面极具热情,认为不能依赖与民众脱节的旧文人,而是呼唤知识分子在“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农村寻找“安身立命的地方”。^[15]但知识专业化为不平等的、等级化的社会关系造成了文化前提,造成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缺少交涉,难逃以自我为中心的“精英主义”陷阱。启蒙精英与民众之间方枘圆凿,存在着难以缝合的扞格与隔膜,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焦虑难以转化为民众认同,“自由”和“民主”等现代性价值找不到生存土壤,难以形成国家意识形态。

1920年代,成舍我敏锐地发现了启蒙精英的传播困境,批评了他们“文化运动”当作“少数人的专利”,忽视民众的倾向,主张应扩大覆盖面,借助报刊,发动一场“彻底的大规模的文化运动”,实现改造社会的目标。在成舍我看来,舆论家是社会导师,传媒、学校和书店等新型文化机构是改造社会的利器,因而积极参与办报馆、开书店等各项文化事业。鉴于北大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成舍我对创办大学评价极高,认为“有健全的人才,才可以做健全的文化活动。来造就这种人才的地方,就是大学校”。^[16]在“立国”先“立人”民族主义脉络下,如何将现代国家意识内化为民众心理,成为成舍我思考的中心话题,报纸、书店、学校,成为了未来成舍我的努力方向,体现了一个以启蒙民众,实现民族建国为人生目标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

二 “立报”:培养现代国民需要创办大众化报刊

民族主义是将松散的与原子化的大众改造为有意识和聚合的群体的催化剂,它依赖大众传媒的散布与传播,由此将特定区域内的个体整合起来,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形成集体性的行动。多伊奇在《民族主义与社会沟通》中认为,“现代社会的传播体系塑造了现代式的民族认同”。借助于大众媒介,现代民族观念才得以穿越广袤的国土影响数量庞大的民众,形成具有共同利益和文化象征的民族

共同体。^[17]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延续此种思路,认为传媒与民族主义的建构与传布存在密切关联:“我们常常会在新国家的‘建造民族’(nation-building)政策中同时看到一种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一种经由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系、行政管制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18]此说切中肯綮,于后发现代国家而言,迫切需要利用民族主义来召唤现代国民的“出场”,建构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

抗日战争的爆发,迫切期待传媒在民族的大纛之下,将原子化的个体整合成按照共同目标行动的集体性反抗力量。这使成舍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立报”与“立人”之间的关联,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解决启蒙困境的迫切性,急需为民族国家合理化寻找新的报纸形态。“中国真正的根本矛盾,只是最大多数的国民,知识太低,不认识国家,过分缺乏了国家意识”,^{[14]81}这于抗战是极为不利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国报纸没有意识到报纸与救国之间的关系,报价太贵,民众难以承受;二是所登载内容与普通民众生活缺少挂搭,多是“要人的来去,宦海的升沉”,民众没有阅读的必要。抗战胜利前夕,在讨论如何安排战后重建时,成舍我强调报纸能传播现代国家意识,在“改造国民心理,转移社会风气”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建国首须建报”。通过创办大众化报纸,将现代国家意识内化为民众心理,缝合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报业的当务之急。

(一)大众化报纸是塑造国家合法性的平台

“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是以民意为其合法性基础的,权利是形成国家忠诚的坚韧纽带,民心之得失事关国家之安危。报纸既是民众表达民意的渠道,也是民众参与政治、监督政府的利器。简言之,报纸必须能代表民众,表达民意,彰显人民主权的政治合法性。对此,成舍我呼吁报界,对报纸进行“大众化”改造:办小型报,降低报价,以求“人人买得起”;报纸“内容应由政治转到广义的社会”,关心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使报纸“确能代表多数的勤劳民众,替多数人说话”,并改变文字艰深的弊端,以求“人人看得懂”,促成“报纸下乡”,“报纸入伍”,达致“工作者有其报”的目标,如此方能真正代表民意。

(二)大众化报纸是内化国家意识的渠道

国乃积民而成,只有将国民意识内化为民众心理,民众才能形成强大的国家认同。但中国民众缺乏参与政治的渠道,“愚昧”、“闭塞”,缺乏民族国家意识。“最大多数国民,无法与报纸接近,国家大事,知道的机会很少,国民与国家,永远隔离着。在如此形势之下,要树立一个近代的国家,当然万分困难。”^{[14]101}而报纸则是塑造国民意识,培养现代国民的重要渠道。抗战期间,成舍我认为报纸犹如“纸弹”,建议政府应建立统一的宣传机关,制订统一的宣传目标,利用报纸,将抗战纲领“像水银泻地似的,钻入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识字民众的神经中枢”,^{[14]118}“唤起全国民众,共赴国难,抵御外侮”,取得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前夕,成舍我认为提升民众的政治认知水平,增加其忠诚于国家的责任感是抗战建国的重要内容。“只有开发最大多数国民的知识,让他们了解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这才能有起死回生的希望,”明确要求国民政府在战后重建中,将新闻事业置于优先地位,通过国家扶持与报人努力,努力实现报纸大众化,使“报纸”成为如粮食、布匹一样的生活必需品,“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坚固。”^{[14]101}

在后五四时期,成舍我继续延续了对五四“立人”困境的思考。他意识到,面对民族危机,民众已经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报业需要改变晚清以来的精英化办报路线和传播路径,而是以下层需求为基础,重造报业,实现民族建国的目标。由此,中国迫切需要创办大众化报纸,改变报纸为少数人所享受的“高贵食粮”的局面,并“借着报纸的力量”,唤醒全体民众,意识到个体幸福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国家和个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才能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因此,“‘大众化’报纸是向民众灌输‘国家意识’、‘民主政治’的利器,是促进‘国民精神养成’的温床,也是加强公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教材。”^{[14]5}建立现代国家,这是成舍我思考报业的绝对道德律令和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为此,他极力倡导“资本和言论分开,报纸与社会合一”的办报方针,以社会监督的方式来摆脱资本对报社的垄断,保证报纸为民众说话。成舍我从抗战救亡,民族建国的历史需求出发,意识到了传媒在建构现代意识形态,培养现代国民方面的巨大作用,开出了新闻教育合理化的设计路线。

三 “立己”:大众化报刊需要“手脑并用”的大众化新闻人才

报纸是由报人来主办的,这是实现大众化报纸的枢纽性环节,如此方能解决知识精英与民众扞格,情感隔膜使传播难以收效的困局。“立报”先需“立己”,拉近报纸与民众距离的关键,是拉近报人与民众的距离,报纸大众化的实质就是记者“大众化”。1930年,成舍我访问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深受该院“动手做”导向新闻教育的影响。1933年,在报童攻读学校基础上,为“改进中国之新闻事业,及训练‘手脑并用’之新闻人才”,成舍我创办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设计了七年制的新闻训练课程。学生半天学习(用脑),半天实习(用手),并将这种新闻教育与记者的平民化联系起来,要求新闻教育要走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化误区,消除劳资对立和体脑差别,提倡“高深的研究和普通技术的训练都不偏废”的新闻教育:“从未来报纸大众化的倾向着想,消弭劳资对立,并训练手脑并用的工作者,更有急切的必要。”^{[14]96}

(一)动手能力

民族建国要求报纸大众化,由“政治转入社会”,深入民间,报道民间疾苦,反映群众呼声,“成为人民的报纸”。从这种要求出发,成舍我认为报业人才要改变五四知识分子象牙塔化的倾向,纳入平民教育和工读教育的内容,接受平民子弟入学,培养他们排字、印刷、制版、发行、簿记、广告及完成其他事务的动手能力。通过生源平民化和技能工人化,沟通传媒与民众之间的情感,改变精英与民众之间彼此隔绝的互动方式,主动、自觉地融入民众,实现深切关注民众生活状态的目标。

(二)动脑能力

民族建国要求报纸成为公民教育的渠道,承担提升社会,传播民主政治意识,养成现代国民的人物。从这种要求出发,成舍我主张报业人才既要源于民众但又要高于民众,在掌握动手技能的同时,还需接受文化和理论训练,常识充足,学有专长,成为了解新闻规律的职业记者和报业管理者。经过这样“手脑训练”的报业人才,既可做印刷工人和广告发行,又可做记者和报业管理者。如此“才可以算一个完全的新闻记者,而脑力劳动和筋肉劳动也就可以合而为一了”。^{[14]88}

成舍我主张新闻教育要培养“手脑并用”的人

才,并不仅着意于培养全能型新闻人才,而是在其民族主义视阈中,通过这种以报纸大众化为导向的新闻教育,打破传统编辑人员和印刷工人之间互不统属的特性,打通“脑力劳动和筋肉劳动”之间的等级化界限,“取消长短衫之别”,上至社长、编辑,下至排字工人,职业权责可交互轮换,都能凭借其能力参与报纸的编辑,并通过这样“手脑并用”的人才,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中坚力量,改变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之间的疏离状态,使报纸能成为民众的“生活日常品”,走出五四启蒙的“精英主义”传播困境,实现国民意识“落地”的目标。

四 “立教”:“大众化”人才需要“西儒互通”的新闻教育

在民族主义框架下,成舍我将“报纸”作为立人立国之具,以“大众化”为实现途径,以“手脑并用”的新闻人才为依托,在这样的视域下,成舍我认为不能再依赖旧文人,驳斥了时人将新闻教育依附于报馆,以“学徒式”教育培养新闻人才的说法。在成舍我看来,记者应改变知识精英与民众的交往方式,深入民众,灌输国民意识。新闻教育应实务与理论并重,兼具“职业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双重属性,并经由这种教育以培养“手脑并用”的大众化记者:“新闻教育一方面是职业教育,一方面也是文化教育的一种,技术的训练和学理的研究,都应该同样重视。”^{[14]97}

(一)面向西方,建立与职业相应的专业技能与知识谱系

作为自美国移植而来的中国新闻教育,深受西方科学理性思维的影响。主张新闻教育必须建构相应的“科学化”的专业技能与知识谱系。

1. 新闻教育乃职业教育,记者应具备专业之“术”。记者是现代分工的产物,承担为社会提供新闻产品的职能。由此,新闻教育属于“职业教育”,应以实践作为教育的基础,以报馆作为实习基地,校企合作,以培养具备职业记者为目标,记者应熟悉新闻生产流程,全面学习采写、编辑、校对、印刷、广告和管理等各项新闻业务,能够全面参与新闻编辑与报业管理,成为具有“动手能力”的记者。

2. 新闻教育乃文化教育,记者应具备通识之“学”。在成舍我的民族主义视域中,报纸承担引领文化,改造社会以建立现代国家的职能,新闻教育应具备“文化教育”的属性。记者在掌握各项新闻

业务的同时,还应具有“动脑能力”,即掌握现代新闻理论和科学知识,了解现代传媒的运作规律与社会职能。其课程设置,则要求在专业课程之外,“则专注意于法律、政治、经济和若干主要的社会科学,其程度,将与一个完全法科大学相当”,以建构“通识化”的知识谱系。^{[14]88}

(二)面向传统,建立与职业相应的专业伦理与人格追求

密苏里新闻教育的“专业化”面向是以否定科学与价值的直接联系为前提的。在“专业化”原则之下,记者的职业活动与特定的道德目的没有任何关系,他必须信守客观立场,而将价值判断留给受众。新闻教育的宗旨,旨在训练记者获取新闻的职业能力,以服务社会,并提供社会流动的上升通道。

鉴于国家转型的历史要求,成舍我在接受西方新闻理念的同时,又时刻警惕报纸商业化沦为资本家牟利工具的危险。如果如西方一样,记者仅是提供新闻,而将价值判断留给民众。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国家意识难以内化为民众的认同与忠诚。在现代国家不再需要意识形态解释阶层的情况下,成舍我依然认为“知识分子是中国政治的重心”,赋予记者“是社会组织的中枢,是时代文化的先驱”的地位,^{[14]94}激活济世拯民、忧乐天下的传统士人精神。西方报纸大众化“只是使报馆变成一个私人牟利的机关,而我们的大众化,却要准备为大众福利而奋斗,我们要使报馆变成一个不具形式的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我们始终认定,大众利益,总应超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14]100}从这种道德主义立场出发,记者接受新闻教育不再仅获得新闻职业能力和社会上升通道,而是要打破学院与社会的藩篱,将“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天下精神”转化为向国家、民族负责的职业精神和公民伦理,承担再造文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责任,树立接近民众,引导民众,改造民众的精神品格和职业操守。

五 结语

晚清以来,先进知识分子虽意识到了报纸是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利器,但却不知道如何着手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闻教育。正好留美归国学生,尤其是密苏里大学毕业的学生,带回了一套既具价值规范,又具操作性的新闻教育模式,适应了中国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加上以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士为代表的美国新闻教育家和记者,基于美国利益的

需要,大力支持,因而被民国新闻界所接受,迅速完成了它的合理化设计,成为高校教育的建制化组成部分。

在民国新闻史上,成舍我乃是“行动型”人物,非以思想建构见长,他的新闻教育“采用实用倾向为主,理论的建构和主张的内容上,往往并没有很严谨的划分与深入的研究,”^[19]缺乏系统学术架构。“成舍我方案”的合理化设计,具有理性化、世俗化的现代性特征。按韦伯的观点,“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20]56}简言之,即指通过精确计算,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实现最大功用。在“成舍我方案”中,这种最大功用诉求表现在商业价值与社会改造两个方面:(1)商业价值诉求。现代报业本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具有商品特征。作为报馆老板,成舍我有着追求报业托拉斯的勃勃雄心。他的新闻教育及其实践,有着强烈的商业动机。为此,成舍我对民族主义进行自由主义式解读,认为国家要以人民主权为合法性原则,保障人民权利,为传媒划出了自由空间。“成舍我方案”的合理化设计,新闻教育向报业输送专业人才,能够提高生产率。有着降低人力成本,对抗“报霸”,扩大发行,实现最大利润,获得竞争优势的功利计算。只是因受限于民国战乱、经济凋敝与报业衰微等因素,成效不大。(2)文化改造诉求。在建构现代国家过程中,如何“化大众”一直是知识精英的历史难题。知识精英虽充满传播热情,但知识鸿沟与社会地位构成了与民众之间的等级化前提,造成了传受之间的传播困境。为解决这一传播困境,成舍我又对报刊商业动机保持警惕,赋予民族主义以道德主义内涵,新闻教育不仅在于获得上升通道,更在于承担社会责任,最大限度地发挥传媒的社会整合功能。他赋予了“动手做”的密苏里模式以文化改造的内容,提升了新闻教育与职业记者的社会地位。推动记者深入民间,重建记者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报纸形态,实现“工作者有其报”的目标,如此“全国的报纸,与全国的民众,打成一片,通力合作,才可以小之增进社会的福祉,大之突破民族的复兴。”^{[14]50}通过传媒的思想传布与社会改造,松散的、原子化的个体,就能整合成具有共同意志的民族共同体。在这种合理化路径中,大众传媒与新闻

教育是由民族危机与国家需要召唤出场,其作用在于推动民众、报人和国家三者紧密结合,促成现代国家的形成。

成舍我将民族救亡寓于报纸大众化之中“大众”既是民族主义的主体,又是市场主体,“非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主体与“资本主义”的市场主义主体彼此存在矛盾与冲突,有着背反资本市场原则的理想性。^[21]但市场经济也有另外的一面,它以自由交易和公平交换为原则,在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与法治管理原则下,能够将漠视公众利益、缺乏社会责任意识的媒体淘汰出局,具有自我净化、自我组织的功能,并经由这种自我净化,将“资本主义”的市场主体的坐实为“非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主体,再造新的文明形态与民族国家。“成舍我方案”融合了西方专业主义和中国传统士人精神,将学徒式新闻教育和建制化高校教育加以整合,将新闻职业化与报纸大众化结合起来,以实现其“非资本主义”的“化大众”目标。为此,成舍我兼顾报业盈利与改造社会之需求,力求在自由与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并将其落实为制度安排与社会监督,是一种以文化运动为里,实用主义为表的新闻教育架构,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 [1] 龙 伟,任羽中.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2]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 [3] 张 咏,李金铨.密苏里新闻学院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M]//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4] 李建新.民国时期新闻教育思想的多元呈现[J].学术交流,2016(5).
- [5] 汪 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M].北京:三联书店,2008.
- [6] 唐志宏,连慧珠.成舍我的新闻教育实践[J].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11(35).
- [7] 曹立新.世界变了,何以立报:新闻史中的“成舍我方案”之研究[J].中华传播学刊,2012(21).
- [8] 阳海洪.论《湘报》对近代传媒合法性论政的逻辑路径及其特征[J].国际新闻界,2012(8).
- [9] 成露茜,唐志宏,李明哲.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实践:成舍我的“非资本主义大众化报刊”[J].新闻学研究,2011(1).
- [10] 唐海江.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成舍我自由报刊理念的 formation 及其困境[C]//李金铨.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读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
- [11] 暨爱民.“自由”对“国家”的叙述: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 [12] 成舍我.世界主义与帝国主义[N].民生报,1929-01-15(1).
- [13] 舍 我.就算是我的感想[N].世界日报,1931-03-19(2).
- [14] 刘家林.成舍我新闻学术论著:上册[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 [15]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N].晨报,1919-02-23(1).
- [16]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97.
- [17] 梁雪村.错置的议题:西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得与失[J].外交评论,2015(2).
- [18]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叻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87.
- [19] 成露茜,唐志宏,李明哲.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实践:成舍我的“非资本主义大众化报刊”[J].新闻学研究,2011(1).
- [20]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21] 唐海江.论1930年代北平新闻学话语的逻辑构成与纠葛:以《世界日报·新闻学周刊》为文本个案[J].国际新闻界,2009(2).

责任编辑:李珂